

学界展望（语学）

〔日〕佐佐木勋人 千叶谦悟 野原将挥 户内俊介
石崎博志 池田晋 八木坚二 铃木庆夏
刘川菡 译

绪 论

接上集，语学部分的学界展望由日本中国语学会负责执笔。旨在针对2018年1月至12月一年间日本国内公开发表的著书及研究论文做一个介绍。但是，涉及重要内容也会提到海外发表的研究成果。

从去年开始，学界展望（语学）开始在《日本中国学会报》（日本中国学会）和《中国语学》（日本中国学会）两本杂志上刊登。似乎很多日本中国语学会的会员从那时才第一次知道这个板块的存在，着实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虽然当时我们得到了大部分人的好评，但也有会员提出了他们的宝贵意见，说列出的研究成果会不会有所倾向，不够全面。关于这点我们去年也说过，本板块是允许执笔人凭个人意见来选择有趣的研究成果的，而且希望他们这么做。今年仍坚持这一方针。另外还有一点，下面的正文中可能会出现一个研究成果被多个部门提及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不会进行刻意调整。各位执笔人从不同观点进行时评，亦是学界展望的有趣之处。

部门分类及各部门的负责人与去年一样。文字和训诂合为一个方向，而语法、词汇方向分为上中古、近代、现代三部分来阐述。“绪论”由佐佐木勋人（筑波大学），“音韵”由千叶谦悟（中央大学），“文字、训诂”由野原将挥（成蹊大学）负责。“语法、词汇”的上中古部分由户内俊介（二

松学舍大学), 近代部分由石崎博志 (佛教大学), 现代部分由池田晋 (筑波大学) 负责。“方言”由八木坚二 (国土馆大学), “教育”由铃木庆夏 (神奈川大学) 负责。

(佐佐木勲人)

一 音韵

关于语音、音韵相关研究的单人著书, 第一个要举出的是平山久雄的《敦煌〈毛诗音〉研究》(好文出版)。作者平山久雄于1966年发表《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的研究(上)》(《北海道大学文学系纪要》14-3)之后, 又陆续在《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中刊登其续篇, 关于毛诗音多有考察论述。在此次的著书中他对自己以往的一系列论述进行了总结, 而且将其用中文表述了出来。此书针对7世纪中叶到8世纪中叶的音系资料做了综合性研究, 有望成为现代日本在汉语音韵学方向上的代表性著作。第二个就是庆谷寿信的《中国音韵学论集》(好文出版)。作者庆谷寿信对近世音颇有研究, 在上古音和中古音研究方向留下不少见解。此书将作者的25篇论考集合成册, 对作者的成果做了一个收录。

接下来是单篇论文部分。首先是上古音方向, 我要举出野原将挥的3篇论文。《关于“上古音以母”重构的初步考察》(《中国古籍文化研究 稻畑耕一郎教授退休纪念论集》, 下文记作《纪念》)、《“少”的上古音再考——从同义换读看上古音重构》(《中国文学研究》44)和“Old Chinese ‘west’: *snʰər”,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9-4。他近年来埋头研究取得的成就, 展示了日本年轻人在音韵研究上的水平之高。

中古音方向, 我要列举4篇论文。铃木慎吾的《关于中古汉语的韵母体系——唇音性的有无, 从喉音韵尾二分说说起》(《中国语言学》265, 下文记作《语言学》)、平山久雄的《切韵同母韵组第2小韵亦同母的例外解归根——兼论痕韵替“中韵”后增问题》(《开篇》36, 下文记作《开》)、郑光的《反切考——理解“俗所谓反切二十七字”》(《开》)、水谷诚的《关于“类篇”的无义注》(《纪念》)。另, 从中古开始跨越近代的有林英津的《从高丽译音(Sino-Korean)看汉语音韵史上的送气清声母》(《开》)。

近世音方向, 我首先举古屋昭弘的《关于廖纶玘的“满字十二字头”》

(《纪念》)。此论文确认了廖纶玑(即《拍掌知音》的作者)为廖文英之子,是广东省连州人这一事实。还指出,廖纶玑之所以能(在他人帮助之下)编纂出闽南语的韵图,可能就与他成长在连州这种语言环境复杂的地方而培养出的多语言能力有关。还有,山口要的《从麦都思〈华英字典〉看19世纪官话音系》(《开》),此文用Medhurst字典考察了来华传教士们掌握的19世纪官话音系;岩田宪幸的《“南京音”和“浙江音”——“唐音”研究》(《国际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20),此文利用朝冈春睡的《四书唐音辨》(1722)研究了当时传入日本的汉语语音。关于现代音,我就简单列举东孝拓、王韞佳的《普通话后接声调对焦点音高的逆向作用》(《语学》)一文。

方言音韵及地理语言学方向,首先,我要举以官话方言为对象的以下五篇:远藤光晓的《山东方言单字调的时序语言地图》(《经济研究》10),秋谷裕幸的《江淮官话桐城方言中的咸摄一等重韵舌音字》(《开》),日高知惠实的《关于中国·徐州方言语言变异中出现的年代差》、胡贵跃的《中国徽州方言“母狗”及其地理分布》(均为《人类社会环境研究》35)和千叶谦悟的《J. A. Ingle〈汉音集字〉(1899)和近代汉口方言》(《中国文学研究》44)。下面着重介绍一下第一篇《山东方言单字调的时序语言地图》。此论文通过三维视野描述了多个城市、村落的同一语言特征在不同时期分布情况,是运用时间轴语言地图(time series map)做纵向对比的研究。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由于研究时参考了神父所写的“1940年代山东方言资料”,远藤在论文中对Franz Giet神父的生平和功绩也做了介绍。另外简单说一下第三篇《关于中国·徐州方言语言变异中出现的年代差》。这是一篇将160名被调查者的出生年份以每10年为一个单位进行分组,从13个调查项目刻画出徐州方言年代差的力作。

接下来说一下以吴语为对象的研究,有以下3篇值得一读:平田直子的《关于现代吴方音中的古匣母细音字、古喻母字的声母表记——从摩擦强弱的差异这一观点出发的方法》(《北九州市立大学外国语学部纪要》147)、季钧菲的《〈南通方言疏证〉研究——以孙锦标注通俗音为中心》(《神戸市外国语大学研究科论集》21)和大西博子的《二甲方言的单子调的声响语音学方面的分析》(《近畿大学教养·外语教育中心纪要外语编》9-1)。

最后,提一下由日本中国语学会全国大会(神戸市外国语大学)举行的两次研讨会“从外部资料询问近代口语——文献语言学的挑战和课题”

及“汉语方言和普通话里的声调特性和时长分布模式”。这两个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语音、音韵研究的计划，意义深远。前者以文献语言学的观点，具体针对（在音韵、语法方向上）如何运用欧文资料做历史性研究这一主题做了概括和展望。吉川雅之以《境外资料的粤语研究》为题，千叶谦悟以《境外资料的官话研究》为题，柯理思（Lamarre Christine）以《境外资料的客家话研究》为题，岸本惠实以《欧文资料的日语研究》为题做了报告。后者主要讨论了在共时的视点上进行汉语声调的建模。远藤光晓以《曲折调的诞生和消失》为题，王红娟以《晋语上党片的声调特性》为题，八木坚二以《汉语方言轻声的频率地图》为题，王萍以《汉语普通话不同语句类型的时长分布模式》为题做了报告。

（千叶谦悟）

二 文字·训诂

关于出土资料的研究今年也很活跃。以下几种研究成果格外引起了笔者的兴趣。首先介绍一下工藤元男的《睡虎地秦简译注》（汲古书院）一书，此书是中国史专家对《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三篇做的译注。鉴于这三篇都是睡虎地秦简的核心资料，所以本书可谓研究秦简的必携之书。另外还有谷中信一编的《中国出土资料的多元研究》（汲古书院）一书，此书收录了国内外有关中国出土资料的最新成果（不仅有学术论文，还包括译注等）。本书的第一篇论文是大西克也的《研究“非科学发掘简牍”方法论》，跟同作者在2017年发表的《浙江大学藏〈左传〉能作为研究资料吗》一文相比，从更多角度明确了研究“非科学发掘简牍”时需注意的问题点和使用标准，非常推荐大家一读。

接下来介绍定期刊物。《中国研究集刊》珍号（64）中有草野友子审校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黄德宽著），该书翻译了安徽大学所藏的有关战国竹简的报告。该竹简中包含了很多与《诗经》相关的竹简，如果正式出版的话，不仅对古文字学，对语言、文学等各个领域也都会带来划时代的学术价值。另外，福田哲之的《清华简的字迹及其关系性——以第一类A、B、C种为中心》指出笔迹和文献性质之间是有关联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祭公之顾命》中指出，“我”字的形体在12号简之后有了变

化,其实,标点符号(墨钉)也和“我”一样,从12号简开始出现变化。清华简今后也将继续公开发表,期待能对新材料做进一步的研究。竹田健二的《清华简〈越公其事〉的竹简排列和划痕》一文针对解读竹简时具有关键意义的“划痕”展开了一系列论述。他指出在《越公其事》中常见划痕和所谓的“逆次简册背画线”并存;对划痕的连续性进行仔细分析有可能为竹简排列方案提供旁证。

《汉字学研究》每一期都收录金文的译注《金文通解》,值得重视(第6号所收)。《古文字学研究文献提要》一文对重要论文做了提要,非常方便。村上幸造的《上古音入门 通假字的上古音概说》介绍了研究“通假”时所必需的上古音基础知识。讨论通假时,经常能看到“音近可通”之类的语句,但是“音近”到什么程度可以通用,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共识,所以该论文所做的相关论述很有价值。但是,该论文并未深入讨论圆唇/非圆唇元音之间对立以及 T-type/L-type 之间独立等与通假现象相关的重要题目,所以建议该论文要跟古屋昭弘(2009)的《上古音的开合与战国楚简的通假例》,和古屋昭弘(2010)的《上古音研究和战国楚简的形声字》等一起读。

《东洋文化》98以《出土文献和秦楚文化(I)》为题编了特辑。其中,海老根量介的《关于战国时期楚国的〈日书〉的利用》以九店楚简的《日书》为资料,从“文字知识向社会渗透、扩大”的观点出发,对楚国的日书的形成和传播进行讨论。宫岛和也的《试论合音词“诸”在出土文献中的分布及其含义》以出土资料为中心,对“之”和“於”合音而来的“诸”的分布进行了调查,指出“诸”源于鲁国方言,与儒家文献的关系密切,还推测“诸”作为文化性词语渗透到了各地的书面语中。虽然因为各资料的出土地点存在集中不均衡的偏向,使该文的论述有隔靴搔痒之感,但不容置疑的是本文的确是一篇充分利用了出土资料优点的好论文。户内俊介的《从甲骨文的非宾格动词来看“不”和“弗”的否定功能差异》从动词的结果状态(或状态完成相)和“致使”的角度对甲骨文中“不”和“弗”进行了论述[最新的研究成果请参照户内俊介(2019)《甲骨文的“不”和“弗”》《汉藏语系诸语的语法现象2》]。

(野原将辉)

三 语法、词汇 (上中古)

先从单行本、户内俊介著的《先秦功能词的历史发展——上古汉语语法化研究序论》(研文出版)一书开始看。读过本书就会明白,作者虽以“语法化理论”为主题,却心怀更长远目标,他在寻找“更具普遍性的汉语语法史研究该怎么做”这一课题的答案。先说一下该书主张的一个要点:对于一些已经历过一次语法化的语法形式而言,它的语义扩张等变化可能不会就此立即停止下来,甚至随着变化的进一步发展它会成为一个拥有更多含义的语法形式,这种变化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语法化”,本书称之为“广义的语法化”。在这个框架下,作者以上古汉语“于”“而”“其”为例,就其在含义上的功能性扩展进行了论述。另外,本书除了传世文献外还广泛使用甲骨文、金文、楚简等出土资料,从而将整个先秦汉语作为研究对象,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单篇论文中,我首先要推荐市原靖久的《关于上古汉语的第一人称代名词“我”和“吾”》(《语言学》)。作者将第一人称代词的分用原则分为两种,一种是主语和对象语的独立性薄弱,同时会考量他人的相对客观的“我”,另一种是作为动作的主体和承受者,并伴随个人情感的独立特别的“吾”。即“我”作为主题或受事功能而略缺主体性,是对他人存在自觉的相对的、客体的第一人称代词;“吾”则作为施事或承受者功能而伴随个人情感,是具有主体性和个别性的第一人称代词。作者据此反对格分用说和强调说等原来的观点。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作者市原先生指出虽然在宾语中通常使用“我”,但在代词作为宾语倒置于动词前的否定句中,“吾”也会出现。例如“不吾知也”(《论语·先进》篇)。虽然如上作者在论文中将此现象作为例外来处理,但纵观上古文献,其用例数不能不予重视。尽管如此,本文以谓语中动词的语义分类为基础对第一人称代词展开了缜密的讨论,可谓极富说服力。

接下来是宫岛和也的《试论合音词“诸”在出土文献中的分布及其含义》(《东洋文化》98)。论文指出“诸”字源于鲁国方言,与儒家关系密切。但清华简中有“诸”字出现的文献都很难跟儒家建立联系,而且清华简一直以来被认为没有受到儒家的影响。但最近公开出版的《清华大学藏

战国竹简(捌)》(参见下文)收录的文献中是有描述孔子的对话的篇章(《邦家之政》)的,由此看来清华简和儒家也有关系。但遗憾的是那篇文献里并没有“诸”字。关于“诸”是否鲁国方言,宫岛自己也承认这只是一种可能,期待今后有更多的资料来论证,但本论文尽可能地参考了目前可以使用的出土文献,文献资料方面具有较高的客观性。

接着是山田大辅的《关于古代汉语的时间副词“既”“已”的功能变迁——以汉代、魏晋南北朝为中心》(《开》)。该论文从“既”“已”都是“完成相”(perfective)标志这一共同点出发,指出从使用频率角度来看两者在历史上存在着交替占据主位的规律:“既”(春秋、战国前期)→“已”(战国后期、秦汉)→“既”(魏晋南北朝)。其中,关于为何汉代以后“既”的使用再次超过“已”,作者推测与这两个词所产生语法功能的扩展关系密切。虽然在“既”和“已”是否真的是 perfective 这一问题上我们还需要更深的探讨,但是该文在严格调查各个时代的用例后,将使用比例数值化,仔细研究其功能的变迁,是实功一件。

接下来我想说一下发表于海外的论文。大西克也的《说“见”——清浊音变构词另解》(《历史语言学研究》12),是一篇在语法和音韵两个领域都会产生重要影响的论文。“见”属于清浊别义词。历史音韵学者一般认为声母的清浊对立表示上古汉语中语法范畴之别,如态(voice)或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之间的转换等,并把这个现象较为直接地与藏缅语里的形态现象联系起来。

但是大西先生认为,“见”的清浊对立只是一种从表示视线移动的“见”(清音),向表示对象侵入视野的“见”(浊音)的转喻意义扩展,并非语法现象。本论文的论述对象虽然只有一个,却给近年来喜欢将清浊别义与藏缅语的形态简单地联系起来的上古音研究方向敲响警钟。这也强烈地提示在做关于上古形态论的研究时,第一步必须是对个别的用例进行详细研究。

综上所述,2018年,代名词、介词、体等古汉语的“主流”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另外,陆续出版了相关专著,其充实程度也超过往年。其中,年轻学者的表现尤其引人注目,这反映了有志于古汉语研究的年轻学者不断增加,客观看来这种趋势还将会持续下去。

最后来看看资料方面的成果。新出版的出土文献方面,有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中西书局)。

书中收录了儒家系、墨家系等先秦失传的 8 篇古籍。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多,上古汉语的地域性研究有望得到进一步发展。传世文献的译注有野间文史的《春秋左传正义译注第三册〔文·宣·成公篇〕》和《春秋左传正义译注第四册〔襄公篇〕》(均为明德出版社)、渡边义浩的《全译颜氏家训》(汲古书院)、川合康三等的《文选 诗篇(一)~(四)》(岩波文库)、山田大辅的《读佛教汉文(二)——〈百喻经〉卷第二校注训译稿》(《火轮》39)等。上述译注的目的都是用日语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古代中文文献,当然,这些译注的出版也将给以日语为母语的古代汉语研究者带来莫大助益。

2018 年也不断有关于古汉语学习的名著得到修订、再版,比如有前野直彬的《精讲汉语》(筑摩学艺文库)、滨口富士雄的《重订版汉语语法的基础》(东丰书店)等。

(户内俊介)

四 语法、词汇 (近代)

此处我们将宋代到民国时期的这一段汉语称为“近代汉语”,分别对各种资料进行分类,回顾词汇、语法研究。

关于白话资料的研究,我首先要列举王衍军的《〈聊斋俚曲〉中的能性述补结构及其历时发展初探》(《开》)。作者在论文中对淄川出身的蒲松龄《俚曲》中的能性述补结构类型和现代山东淄川方言的相同构造进行比较,考察了此结构约 300 年的变迁。本论文的结论可总结为:“俚曲”的“V + 的(O)”式结构消失,清初新流行的“VC 了”式结构取代了“V 的 C”式结构成为现代淄川的主要形式。

另外还有,植田均的《〈醒世姻缘传〉成书于明代还是清代?——从语词特点来考察》(《中文研究》60,以下记作《中》)。该论文通过分析一系列词语的用法(表示被动的“吃/喫”,程度副词“怪”“很/狠”,时间副词“已经”,语气助词“呢”,介词“给”等)对《姻缘传》成书时期进行了考察。而且,还通过对《金瓶梅词话》和《红楼梦》进行比较,得出了《醒世姻缘传》完成于清代北方的结论。

接下来说关于满汉资料的研究。首先,竹越孝的《满洲旗人的语言生

活——以清代满语课本为例》(《东洋文化研究》20)和《〈一百条〉、〈清文指要〉对照本(Ⅱ)补遗·索引篇》(《神戸市外国语大学研究丛书》61)两篇,可以说是对满汉资料研究做了一个总括。《Tang·Moyen》(一百条),本来是旗人低下的满语能力及“翻译科举”背景下产生的一本满语对话教科书,先是被活用变为满汉对译本《清文指要》和满蒙汉三语言对译本《三合语录》,之后又变成了如《语言自述集》等纯粹的汉语教科书。竹越孝在论文中对这些书做了比对,查明了这一系列变化是如何发展的。另外还有荒木典子的《关于武藏大学藏〈有图满汉西厢记〉》(《中》),此论文不但考察了与一般流通的京大本体裁不同的《西厢记》的满汉对译本《有图满汉西厢记》的特征,还对其出版时间做出了推断,即其出版于乾隆年间以后。

接下来说一下编写或使用地区不在中国的所谓“域外资料”部分。首先是唐话资料方面,有奥村佳代子的《唐话的传播和变化:冈岛冠山所做出的贡献》(《东亚文化交涉研究》11)。此论文从代词、疑问词、语气助词各方面考察了唐话资料的内部差异。得出的结论是,《译家必备》与汉人对话是为应用场景而编,《唐话纂要》和《唐话便用》则反映了日本人作为一种学问而学的汉语,两类著作中上述3类词的用法均不相同。

关于北京官话,近期有《北京官话全篇的研究·下卷》(关西大学出版社,以下记作《全篇》),此书是一本论文集,收录了与《北京官话全篇》相关的多篇论文。考察对象覆盖了几化、代词、副词、介词、语气词、V着、VP+去、表示类似的表现等。在一系列论述中,《全篇》的书写时间被推断为从《语言自述集》(初版)到《小额》(1867~1908)之间(佐藤论文);还指出《全篇》的内部差异很小(内田论文)、《儿女英雄传》和日本的官话教科书的语言相似性等(渡部、盐山、齐的论文)。另外,《全篇》积极收集了民间口语词汇,在继承清代以前(包含清代)用法的同时,也能看到在之前的资料中很难找到的用例,如“在着”和“程度副词+V着”的形式(稻垣论文)、“词汇化的VP+去”形式(“买东西去”)。还有,儿化现象涉及广泛的词类这一说法也得到了确认(盐山论文)。总而言之,《全篇》可以和《语言自述集》并驱,成为考察北京官话和北京口语的坐标轴。

泰西资料相关的研究中备受瞩目的是盐山正纯的《圣经中的时间表现和汉语文理翻译》(《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51)。盐山的论文根据

《圣经直解》(1636)以后的各种圣书,论述时刻表现和时量表现的变迁,并指出清代用的计时单位是一天96刻钟(1刻钟=15分钟),和英国的时间单位不一致。该文特别关注的是中英之间时间单位的差异如何“翻译”成中文。

译词方向上,2018年有几本单著出版。如荒川清秀的《日中汉字词的形成与交流、接受——汉语词基的意义与造词力》(白帝社),运用词基概念探究了“空气”“健康”“电话”“化石”“盆地”等日中两国语言中共通的汉字词的形成与传播,再次验证了罗存德《华英字典》在近代语言中的影响,也提到了外国地名的意译。清地 子的《近代译词的接受与变化——以民国时期的恋爱用语为中心》(白帝社),从恋爱用语在现代汉语中的传承和对现代汉语的影响两点出发,研究了“自由恋爱、三角关系”等恋爱用语转入汉语的过程。作者还特别关注了这些词语在当代汉语中的传承和影响。论文指出“恋爱”一词所代表的现代概念是从20世纪开始在中国得到广泛理解的,从这点可以瞥见日本创造的词汇在文化传播过程中起到的巨大作用。

田野村忠温的《语言名称“英语”的确立》(《东亚文化交涉研究》11)考察了中日双方对语言名称 English 的译词,指出“英语”这一翻译方式确立于19世纪。还指出,在日语中,“英语”这一翻译方式在最初只是用于书面语,后来才被用于口语;虽然中日两国都将“English”翻译成了“英语”,但找不到证据证明是因为相互影响两国的称呼才一致的。

(石崎博志)

五 语法、词汇 (现代)

在现代语中,我首先想举杨凯荣的《中国语学·日中对照论考》(白帝社)。此书收录了现代语语法、日中对照研究的第一人杨先生的17篇论文,内容涵盖“了”、范围和焦点、数量强调、全称表达、语态等7个部分。书中的每篇论文都是作者埋头研究的成果,而此书的出版也让我们有机会能把这些成果归纳起来读,意义深远。

接下来我想分几个方面来介绍前一段没提到的论文、单行本。

首先,词汇研究方面,有文楚雄、陈敏的《关于中华料理名的构造》

(《岛津幸子教授追悼论集 语言及其广度》6, 以下简称《语言》)。此论文通过对 2000 多个菜名的分析, 广泛而又全面地整理出了中华料理的命名法则: 或根据食材的形状, 或根据烹饪方法, 或根据菜品的起源传说等。目前为止没有学者提到将两种烹饪方法组在一起来命名也是一种中华料理的命名方式, 但是, 本论文的两位作者提出至少有“煎扒”“煎烹”“炸溜”“扒烧”“爆炒”这 5 个例子可以证明这种命名方式确实存在。为何只有这 5 个组合呢? 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此外, 荒川清秀的《漫步中文——辞典和街角的考现学 Part3》(东方书店), 也提到了很多关于词汇的有趣话题。

野田宽达的《关于“事态认识构筑”的“怎么”和 2 个功能》(《语学》), 是一篇研究疑问词“怎么”的论文。作者在论文中尝试对“怎么”的两种用法——询问原因的用法和询问方式的用法统二为一进行解释。得到的结论是, 无论何种用法, “怎么”都是一个说话人为了“认识事态”必要的“理”而进行询问时使用的词, 比如原因用法是问事态成立的“道理”, 而方式用法也无非是问事态内部流程的“论理”。

接着举出两篇关于数量表现的论文。首先是前田真砂美的《表示差别的“A 很多”》(《语言》), 此论文以 1990 年代后半期以来广为流传的“A 很多”为对象进行了详细考察。在对语料库进行调查的基础上, 得出结论: “很多”是数量补语。进而提出了假设: 在普通话中, 这种形式被接受是因为其可以填补同义形式“A 不少”“A 许多”用法上的空白。对于新出现的表现形式, 研究其能够被接受并得到广泛使用的背景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视点。中田聪美《关于“V 了 + 有 + 数量结构”的认知考察——通过与“V 了 + 数量结构”的比较》(《现代汉语研究》20) 考察了为何在数量结构前加上“有”, 比如“喝了有三杯啤酒”, 就比“喝了三杯啤酒”多了“主观大量”之意。另外对这种句型在语法上有何制约也进行了阐述。据中田先生说, 这篇文章反映了叙述者的连续考察, 沿着时间轴逐个认识事件的发展过程, 从而产生了“大量”的解释。值得注意的是, “有”本来是一个动词, 在这里却失去了作为动词时的功能和意思, 仅表示“大量”, 即仅表示一种数量上的主观评价。在汉语中, 说话者的主观评价就像这个句式的“有”一样, 可能潜藏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接下来是构文、句型研究, 李菲提出了《从体验的角度来看“挨 V”被动句的意思功能》(《语言》)。所谓 voice 句型, 除了典型的“被字句”

之外还有一种句型很少被人关注，就是“挨V”被动句。此论文阐述了在该句型中，V的“负面影响”是决定句子是否成立的主要因素。其中颇有意思的是“挨打”“挨骂”等的描写。“挨打”“挨骂”本来表示“体罚”“斥责”之意，即只是一种问题行为，但“挨NV”和“挨N的V”表达了截然不同的语境。前者表达的只是一种具有一般性的行为类型，而后者则相反，倾向于表达对特定人物的个别动作。产生这种现象的理由是值得深思的，正如作者自己所暗示的那样，既具有句子结构又具有习惯用法的两面性似乎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语言》中还有很多研究复句的论文，例如池田晋的《多样性的复句——疑问词连锁句法的形式和意义》、中根绫子的《“一A就B”的形式意义和用法意义》、长谷川贤的《汉语的限定选择句法的典型用法和表达功能》、李佳梁的《北京话的“赶”系列功能词的消长》等。其中长谷川的论文详细论述了“要么A要么B”“要不A要不B”“不是A就是B”这三种形式在功能上的异同。三者虽然都有“是A还是B”的基本含义，但用在一次性事态中还是经常性事态中，A、B的内容是否对立等方面都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征。

小野秀树在《中国人的心——从“语言”看到的思考和感觉》（集英社新书）中，以“中国人对长辈也会回答‘嗯’”“中文里喊人的话会变成寒暄语”等话题为出发点，对汉语及其背后的思考方式做了犀利的分析。随声附和、应答表达、问候、称呼等在日常会话中不可或缺，但这种微妙的语感对于非母语者来说很难掌握。该书在这类问题上有了新的见解，这一点备受瞩目。为了让学习者具备流利交流的能力，今后也有必要进一步加深对这种表达方式的研究。另外，关于称呼的论述还有史彤岚的《现代汉语中对陌生人的称呼语》（《中文语法研究》2018年卷）。

罗希·定延利之在《创造幽默的日中的“停顿”——关于捧哏和逗哏的时机的考察》（《日中语言研究与日语教育》11）中，向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被实验者介绍了漫才（以及相声）式对话后，让他们回答自己认为的最佳吐槽时机，证明了根据笑的类型和语言不同，“停顿”的放置方式也会产生差异。这样的实验研究再次让我们意识到，用声音和文字无法表达的“停顿”也可以成为一个考察对象。顺便说一下，实验中使用的对话是论文作者以“夢路いとし、喜味こいし（日本著名相声大师）”的作品中大家所熟悉的片段为基础创作而成的。

从理论语言学的立场出发的汉语研究，有于一乐的《汉语的非动作主卓越句式》（黑潮出版）。论文从词汇概念结构（Lexical Conceptual Structure、LCS）的观点来说明在结果复合动词结构、供用句、存现句中出现的特殊语序（非动作主语）的产生机制。例如，结果复合动词结构“张三追累了李四”，可以理解为李四追张三追累了（非动作主语）；但“张三冻死了李四”，就不能解释成李四把张三冻死了。作者指出，只要 LCS 记述准确，就没有必要设置如先行研究所说的那些繁杂规则，只要用非常简单的规则就能解释两者的差异。

最后，说一下译著，有沈家煊（下地早智子审校）的《认知与汉语语法》（日中语言文化出版社）和何元建（山口直人译）的《现代汉语生成语法》（好文出版）。

（池田晋）

六 方言

首先，作为类型论研究的代表，我想介绍一下饭田真纪的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antonese and Japanese from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71)。饭田先生常年做广东话的文末助词研究，此论文是其以日语和广东话的文末助词为对象做的比较研究。论文指出两者的相似点：除文末外，助词也会出现在包含某些传达内容的词组或词语的后面；都有开口度大的开音节元音，从而指出文末助词的高使用频率和高义务性关系到传达态度的标示的半义务化、语法化。此外，作者还言及了文末助词和语调的关系，并期待今后的研究进展。说起类型论，往往会想到对主要语言的比较、对照，但前提是其对象为封闭型语言体系。另外，语言地理学则着眼于语言体系的开放性侧面（即变化）而对其进行研究。铃木史己的《试论表名物词多样化的成因——以〈高粱〉义词为例》（《开》）就是一篇语言地理学领域的文章。该文根据“高粱”一词的全国地图展示了词汇演变的方向既有提高词义透明度的方向，也有降低词义透明度的方向。在多种语言的宏观研究方面，远藤光晓的《亚洲地理语言学项目 2015 ~ 2017 概要》（《方言的研究》4）对此项调查对象覆盖至亚洲全范围的语言地理学研究做了概述，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另外，韵律方面的文章有八木

坚二的《汉语方言韵律研究之语言类型地理论课题》(《外国语外国文化研究》29)。语言体系到底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把这种乍看之下截然相反的立场统一起来是个不容忽视的课题。虽然各自坚守立场一步步推进研究很重要,但超越领域的研究交流的深化也是必要的。

语法方面,有佐佐木勋人、樊晓萍的《绍兴话的处置句和被动句》(《现代汉语研究》20)。该论文对绍兴方言的处置句和被动句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使用“则”这个字的处置句包含着无可奈何、不情愿的意思,而这点可能也是造成其使用频度低的原因;“拨”字有“放任使役”的用法,而其能表示被动的的原因很可能就与此用法有关。除此之外,我还想推荐远藤雅裕的《论台湾海陆客语的情态标记“会”》(*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in Oceania* 10)和《台湾海陆客语“识”字的语法化——从动词演变为体标记》(《纪念》)、饭田真纪的《广东话的文末助词连锁的形态论分析》(《语言》等)。

关于语音演变方面的个案研究,有秋谷裕幸的《关于江淮官话桐城方言咸摄一等重韵舌齿音字》(《开》)。此论文论述了桐城方言当中与众不同的语音现象的形成过程。该现象在一般江淮官话当中极少见。另外,还有元海峰、李明兴的《东港方言“蟹止山臻”四摄合口呼u介音的变异研究》(《开》)、蔡佺《古尤韵字在苏州北郊地区的读音与分布》(《开》)。同音字表的研究有蔡芳《安远(鹤子)客家方言同音字汇》(《开》),蔡华样、刘刚《盐城市方言语音概况》(《开》)介绍了盐城市多个地点的音系。

关于描述性研究,我推荐张盛开的《平江方言文化之莲花落》(《静言论丛》1)。论文调查、分析了平江的祝仪歌《莲花落》中使用的语言,并公开了曲目的记音。另外还进一步总结了:《莲花落》的语言在押韵上即兴曲中的舒声和入声、〈-u〉和〈-u〉都是押韵的;其和传统曲目相比更加平缓;从词语和语法上能瞥见口语的说话习惯等三个结论。虽然人们早就意识到了地方曲艺的语言研究价值,但关于地方曲艺的语言学调查并没有大进展,我们期待它今后的进展。

接下来是利用历史文献进行方言研究的论文,这里列举三篇:千叶谦悟的《J. A. Ingle 〈汉音集字〉(1899)和近代汉口方言》(《中国文学研究》44)、山口要的《从麦都思〈华英字典〉看19世纪官话音系》(《开》)和张坚的《两种新发现的早期潮州方言文献音系性质》(《开》)。

以汉语和周边语言的接触为题的研究有川澄哲也的《试论汉语河州话

的形成过程》(《欧亚诸语言的多样性和动态》20)。在杂居着各个民族的甘肃、青海边境附近有一种汉语方言——河州话。作者从动词和目的语的词序、形容词/数量词和名词的词序、格标志及历史上各民族的居住状况等角度推测出:清代中后期土族和藏族曾借用过汉语,“河州话”便是当地汉族模仿并接受这种少数民族所说汉语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Typology of Language Changes of Chinese Induced by Contacts with Mongolic Languages* (《语言文化研究》37-2)也是川澄哲也的论文。此论文以西宁、唐汪、河州各方言,还有《老乞大》等受元代蒙古语影响的文献为基础,分析得出在汉语中受蒙古语影响的形式有以下几种类型:SOV语序、后置格标志、副动词语尾类似成分、复数标志的扩大、用于否定词前面的副词、“有定名词+场所语+有”等。另外,他在*Typology of Language Changes of Chinese Induced by Contacts with Tibetan* (《松山大学论集》30)中,对汉语与藏语的关系也做出了阐述。

另外,还有几篇发表于海外主要杂志的论文,有秋谷裕幸的《闽东区宁德方言音韵史研究》(*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60*),沈明、秋谷裕幸的《吕梁片晋语的过渡型特征》(《中国语文》4),岩田礼的*Chinese tonal neutralization across dialects: From typological, geographical,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Tonal Change and Neutralization, Phonology and Phonetics Series 27)*和石村广的《汉语南方方言的动宾补语序——兼谈与壮侗语的语言接触问题》(《语言研究集刊》20)等。

(八木坚二)

七 教育

教育研究与“关于语言的研究(中间语言、目标语、教育语法等)”和“关于人的研究(学习者、教授者及两者的相互作用等)”大不相同。确实有一段时间学者认为语言研究中那些对某一语言形式或语法现象进行详细解释的所谓记述性研究能都应用在教学上。但是近来,教育研究领域的考察重心已逐渐发生变化:从目标语转移到了中间语言上,从记述语法体系转移到了教育语法体系上。

首先,我要介绍一下针对中间语言及其产出原理进行论证的研究。张

恒悦的《关于中日两语言的比较句——从偏误例“*我比米饭喜欢拉面”入手》(《中国语教育》16, 以下记作《教育》)。该文从日语和汉语的比较句中施事·受事的差异出发, 论述了日本人学习汉语时常见的偏误形式“*我比米饭喜欢拉面”的产生原因和解决这种偏误的对策。还有李佳的《典型动宾搭配在接受性习得与产出性习得的对比分析——以日本中级汉语学习者对象》(《教育》), 作者通过语料库数据分析和学习者实际调查得出: 对那些以日语为母语的中文学习者来说, 在组词的时候把“依照法律”这样的典型动词和宾语搭配起来的情况比较少见, 他们往往会把“根据法律”“按照法律”搭配在一起。

另外,《中国语教育》的“年会报告”提出“重新审视教育语法内涵”的课题。其中丸尾诚的《不能“照搬教科书”》指出, 教科书里关于语法的说明往往比较刻板, 很难让学生一学就能举一反三、运用到具体的相关情况中, 甚至一些内容还会遭到汉语母语者否定。町田茂等人的《重新探讨要点式学校语法》谈到初级、中级语法要点的覆盖范围和深度以及汉语教学中语法学习的定位等多种问题, 在此基础上指出应把“学校语法”定为培养具有高度语言运用能力人才的“汉语基础语法学习大纲”, 并提出了“要点式学校语法(方案)”。张恒悦等人的《基于日语母语者偏误分析的在日汉语语法教学》指出, 现行语法体系多是直接从中国的教育语法上移植过来的, 各种语法现象被同一而论没有分出主次, 从教育角度来说应该以日语母语者容易误用的语法项目为重点展开学习。

关于“人的研究”方面, 近来比较显著的变化是学者在选题上更加重视与社会的关联、更加重视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比如, 教学中要提高学习者什么样的能力、学习者应该怎样与地域和社会建立联系等, 探索外语教学本质的倾向比较明显。

首先, 介绍一下植村麻纪子的《在汉语教学中应用 CLIL 的可能性——以“中国留守儿童”为题材》(《教育》)。该论文是外语教学中实践 CLIL 式学习法的一篇记录。所谓 CLIL 就是“内容与语言融合性教学 [C (ontent) and L (anguage) I (ntegrated) L (earning)]”, 即通过外语的学习探索某一个主题, 并提高“有助于社会的擅长领域”或“与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协作完成课题的合作实践”能力。阿部慎太郎等的《在大学汉语教学中开展绘本朗读活动的尝试》(《教育》)是一个以近年来大学教学中所重视的“citizenship (公民) 教育”为主题的实践报告。“citizenship 教育”是指通过

与地区建立合作、对地区做出贡献,来培养学生身为社会一员自觉性的教育。植村和阿部等人写的上述两个报告也可以理解为对教育活动中所出现的学习者(的学习和意识)变化进行分析的一种行动研究。应洁琼的《基于语言社会化理论的留学生汉语语用能力发展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5)从语言社会化论的观点出发,按时间顺序论述了社会活动对学习者的语用语言能力(pragmalinguistic competence)和社会语用能力(sociopragmatic competence)的进步有何影响。

最后,介绍一下从学习者内侧出发,将学习者语言学习的内发动机等和外语教育的目的相关联进行探讨的研究。具体有陈默的《第二语言学习中的认同研究进展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1)和山崎直树的《不需要“权威”的语言学习之可能性——ICT(信息技术)和学习者自主》(《汉字文献处理情报》18)。陈默的论文是一篇文献综述。论述的内容有:在学习和习得第二语言的过程中对学习者的自我认同(identity)的理解;有什么样的因素影响学习者自我认同的发展;学习者自我认同的发展与第二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教学上解决方法等。这些都是日本国内汉语教学领域里尚未积累相关成果的研究领域。山崎的论文指出,学习者往往有对机器翻译得出的答案不进行验证的倾向。对此,我们有必要提醒学习者对机械翻译不能尽信,并重视学习者所产出语言形式中存在的结构性错误和语用适当性。该文还主张,判断结构性错误和语用适当性的主权不应该归于除学习者自己以外的人,应尽量避免教师成为判断学习者产出的语言形式是否妥当的权威。因为,随着机器翻译精确度的提高,教师的存在对于验证语言结构恰当性的意义会越来越小。况且我们不得不承认,能否自然地参与一段遵守某语言谈话习惯的对话、能否产出符合语用习惯的篇章,关键取决于学生自身的学习和领悟,跟老师在不在身边无甚关系。

(铃木庆夏)

[译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